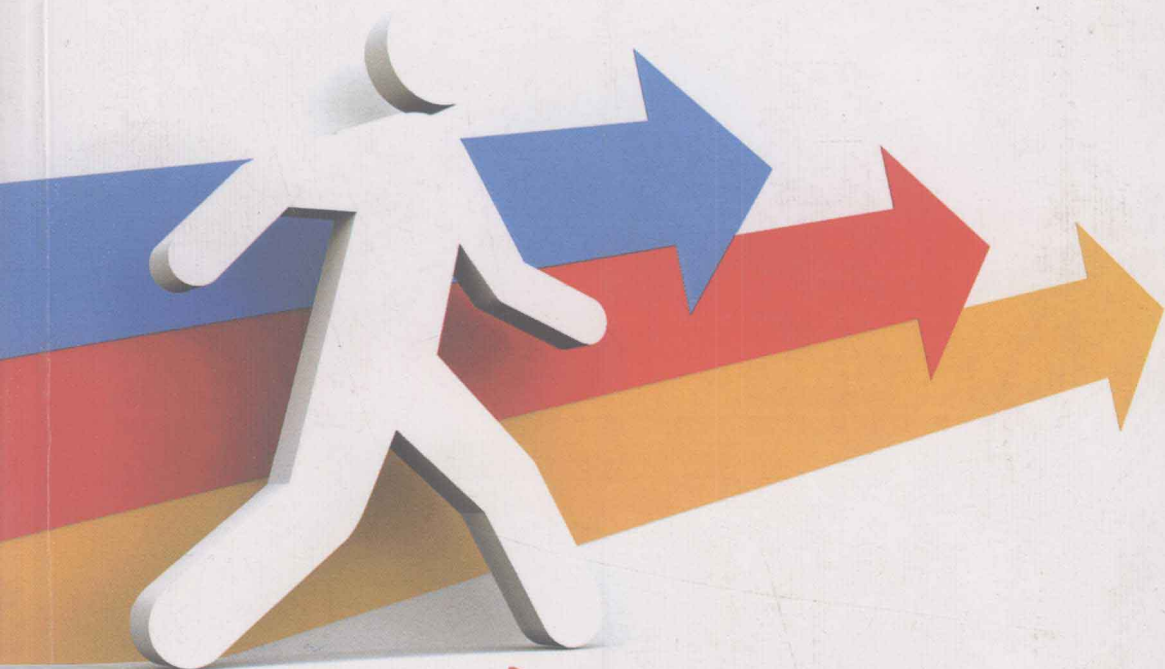


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面上项目资助

市场化改革的 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问题研究

石冀平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市教委社科计划面上项目资助

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价值 取向问题研究

石冀平 著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问题研究 / 石冀平
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43-6553-8

I. ①市… II. ①石… III. ①中国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①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6942 号

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问题研究

石冀平 著

责任编辑 李晓霖

封面设计 人文在线

责任校对 李美清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i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62 (千) 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6553-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 关于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三个疑问 / 1
- 📖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之思考 / 16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论 / 38
- 📖 共同富裕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课题 / 63
-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失业问题
 - 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理论与现实 / 79
- 📖 另类视野中的公共产品
 - 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产品问题 / 104
- 📖 论统筹发展问题 / 120
- 📖 市场经济概念刍议
 - 兼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基础 / 133



- 劳动价值论讨论之管见 / 149
- 重谈马克思计划经济思想及其历史实践 / 164
- 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183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的外部制约因素分析 / 204

- 结束语 / 258
- 主要参考文献 / 260
- 后 记 / 261



关于国企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三个疑问

一、他山之石，真的可以攻玉吗

我国国有企业从 1952—1989 年经济效益一直较好，资金利润率始终是两位数（除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两年困难时期），至少有百分之十几，多则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几。而自 1989 年以后，突然降至一位数，从此一路下滑，1992 年后更是出现大面积、全行业亏损。虽然目前初步脱困，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也可以说，从整体上看，国有企业经过 37 年的辉煌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经济学界众说纷纭，有的从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分析，有的从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分析，有的索性认为，作为公有制的企业本来就不是市场经济合格的



主体。实际上不管作何种分析，都要或明或暗地触及一个问题，即国企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某些举措是否是造成国有企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说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探索过程，那么起码从逻辑上就应当承认改革有可能出现不完善之处甚至失误。国企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不能为每一种改革思路、改革举措的正确性进行证明和辩护，这就犹如医生对疾病的正确诊断并不能证明他的每一治疗措施都正确一样。因此，我们不当回避这个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开始就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1992年后又明确将改革的目标模式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改革目标的界定为改革确定了唯一可能的坐标系和参考系，即西方国家的市场体制。这是由改革目标决定的必然逻辑。但西方国家的市场体制毕竟只是参考系，它是不能克隆的。前苏联的改革已有前车之鉴。正因如此，我们始终强调改革要有中国特色，要符合国情。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改革的设计思想和操作上还是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西欧各国来看，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和推动力。地理大发现开拓了商业殖民范围，也带来了大洋沿岸新兴商业城市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兴起，全国市场的形成，行会限制的逐步消除。近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支票、期票等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给商业交易带来极大的便利。市场需求逐渐成为市



场发展的原动力，工业革命由此发端。就最早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而言，在18世纪初，由于印度优质棉布的强烈市场压力，工业革命首先始于棉纺织业。纺织机最初是水利推动，工厂必须建立在远离城市和交通大道的河边，地主乘机提高地租，使生产成本上升。蒸汽机应“市场压力”而生，并推动了其他轻工业部门的发展。而轻工业的发展又对冶金、煤炭、机器制造业产生大量的市场需求，后者由此发展起来，直至工业革命完成，以近代工业为核心的市场体制完全建立。由此可见，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是商品经济自主生长机制所致。而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设计思想和实际操作来看，是作为对计划经济的否定而提出和形成的，虽然它在目前阶段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其过程则属于自上而下的转型，因而先天缺乏自主生长机制。这是我国与西方国家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最大的区别。由于我们的市场化设计思想没有对这一区别给予足够重视，因而它也就成为国有企业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在改革中认识到，旧体制缺乏以市场需求为核心的竞争机制和成长机制，并因此形成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思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一段时间里，“引入”几乎成了探讨体制改革的核心话语。但是在体制改革中硬件可以引入，软件也可以引入，唯独经济机制是无法引入的。经济机制是在一定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动态关系和动态过程，它本质上带有先天的自主性。社会主体只能设置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使机制产生，而不能人为的引入。由于我们的国企改革思路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而不是使机制自主产生。因此，在具体设计和操作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措施：

其一，从市场倒逼国有企业。在计划体制下，国有企业产品并不直接面对市场和消费，而是通过计划调拨和统购包销两个渠道达到最终环节——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国有企业运行和发展也不以市场作为信号系统和推动力。为了建立市场体制，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对国有企业的产品采取了大幅度取消指令性安排的改革措施，让企业直接面对市场。这种措施孤立看无可厚非，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是，双管齐下措施的第二项则与此对立。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家颇为自得的所谓“从体制外向体制内推进”的战略。让国有企业面对市场，首先要有市场，至少要有开辟市场的余地和能力。但由于我国的改革是由易到难的渐进性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在改革排序中既是中心环节也是最后环节。在此之前所谓体制外的大量非国有企业已经占领了存量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并把可能的增量市场基本开辟完毕。20世纪80年代，对国有企业的技术设备实行“梯度转移”政策，转移对象大都是非国有企业，从而推动大量非国有企业成功地实现了市场的低成本扩张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如棉纺织业的“东锭西移”政策，就是日后国有棉纺织企业市场极度萎缩的重要原因。此外，1992年以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企业大量来华，相继在我国生产和销售产品，使得多种消费品领域和部分生产资料出现了我国国有品牌与跨国公司持有的国际品牌之间剧烈竞争的局面，国内市场日趋国际化。这样做的



本意是以市场换技术，1995 年制定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显表现了这种意向。但对国有企业的实际效果是技术并未流向国有企业而市场则丢了。仅 1992 - 1994 年在进口中，外资企业比重就从 32.7% 上升到 45.8%。其中，仅进口设备就占全社会总投资中设备投资的 64%，等于 2/3 的机电设备失去了市场，使国产机床占有率从 80% 左右下降到 1994 年的 38%。如果说当国有企业真被逼向市场时，存量市场几乎无容身之地的话，那么国有企业在开辟增量市场上也是力不从心。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采取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20 世纪 80 年代的拨改贷不但未使企业增加活力，反而加重了企业负担。1992 - 1994 年是历史上投资极度膨胀期，平均每年投资 12731.5 亿元。一年的投资额相当于整个“六五”时期五年总投资额的 1.59 倍。如果这次投资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上，国有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会大大增强（市场竞争力既由机制决定，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但这次投资的相当大部分投在了开发区、房地产和新开工程项目上。国有企业没有享受到历史上最后一次由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的优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市场，如果一方面从生产环节的末端——市场倒逼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存量市场又没有给国有企业留下足够的份额，同时，也没有给国有企业充足的资金支持来提高开辟增量市场的能力。那么，国有企业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西方市场经济的演进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讲的体制和机制的自主生长，这是一个客体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业化人格的塑造，它是一个主体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没有市场体制和市场机制，商业化人格就塑造不起来；没有商业化人格，市场体制和市场机制就无从体现和运行。市场经济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商业化人格上，它的核心是基于私有制，以个人主义为动力的，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积极进取精神。它在西方市场经济的演进过程中起着巨大作用。我国国有企业要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其经营管理人员必然存在人格重塑问题，即要把过去计划体制下被动的行政型人格塑造为商业化人格。我们是以与西方接轨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从人员培训到制度安排的各个层面上，都以西方的经营目标、经营理念、经营方式为主臬。但这种人格重塑并未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力。“穷庙富方丈”一度成为部分国企老总的真实写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在于商业化人格塑造的本身，搞市场经济必须塑造商业化的人格，这是无可置疑的。问题在于要明确与西方商业化人格形成的区别：其一，西方商业化人格的形成有几百年的商业文化作底蕴，有所谓新教伦理精神作支撑。其二，西方商业化人格的形成始终是以私有产权制度为基础。而我国有着上千年抑商传统和理念，新中国成立后又实行了数十年的计划经济，因此，商业化人格的形成本身需要一个过程和形成的土壤，全盘移植西方商业文化会水



土不服。此外，更需注意的是第二点，即我们的国有企业是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塑造商业化人格的，这与西方私有企业根本不同。对后者来讲，由于产权私有，以个人主义为动力的个人利益最大化是与企业利益最大化一致的。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是公有产权，如果也是以个人主义为动力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侵吞。这是国有企业商业化人格塑造过程中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走入的误区。国有企业所需要的是以公有产权为基础，根植于本土商业文化的商业化人格塑造。人文知识界的创新意识也主要应当在类似这样的方面得到体现，而不应当仅仅体现在谁对西方懂得多，搬来的东西多。

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先有市场经济，后有国有企业。而我国的国有企业是和计划体制相伴生和发展的。它的改革也是体制转换的主要内容。西方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不具有体制转换的意义。因此，西方的经验和具体模式究竟有多少内容可资借鉴，不创造市场机制产生的环境和条件，单纯靠行政手段引入市场机制效果究竟如何是值得深思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看是什么山之石，要攻的玉是什么玉。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使其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继续担当国民经济主导力量的角色，而不是玉石俱焚。

二、国有企业私有化真与意识形态无涉吗

目前谈到国企产权改革，真正能拿到桌面上的提法是非国



有化或民营化，私有化尚不能登堂入室。但从其主张的实际内容看就是私有化。故而本文直接用其真意——私有化，作为主概念来谈。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大部分人士，谈到其主张时有意识地避开意识形态层面，或干脆指出私有化只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意识形态无涉；甚至还有人认为，私有化就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所谓重建个人所有制）。回避者实际认为私有化与意识形态有关，所以要回避。辩白者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其私有化与意识形态是否有关，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常识问题，无需作答。况且持私有化主张的绝大多数人都曾经学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的甚至服膺过马克思主义。因此，对他们也不存在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在此只想对那些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又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抱有善良愿望的人士作一点提醒：

首先，看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国有企业的。

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大体上是在两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是在经济危机和战争背景下，这在美国最为典型。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私人投资不振，迫使国家加大投资力度。大危机前，美国私人投资是国家投资的数倍；1932 - 1937 年，国家投资就超过了私人投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以军工企业为主的大量企业由国家掌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家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占 27%。另一种背景是以



所谓“社会主义实验”的名义，通过国家主导的国有化政策产生的。其典型代表是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利用选民社会改革的愿望，以社会主义实验的名义把国有化政策作为重要政纲争取了选民。工党执政后通过了一系列国有化法案，把包括煤炭、电力、铁路、航空、电信、航运等在内的一批企业或行业国有化，随后又实行部分钢铁工业和英格兰银行国有化。西方国家国有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调整，并不改变其资本的属性，不触及基本经济制度，因而不会动摇作为上层建筑的基本意识形态。但这种国有化毕竟是在私有制限度内社会化生产力的最高组织形式和对私有制的最大扬弃。在一定政治条件下，可以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意识形态上它具有潜在的政治指向性。因此，资产阶级对国有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的警觉性，在制度安排上给予最大程度的限制。如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调整战时经济时就把矛头首先指向国有企业。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垄断组织及其国会议员掀起反对国家所有制的高潮，要求废除国家所有制，把它说成是“爬行的社会主义”，随后就大卖国有企业。1945 - 1954 年，170 亿美元的财产（包括工厂和其他设备）以 41 亿美元卖给私人 and 各公司。1950 - 1954 年，还把账面价值 22 亿美元的国家财产以 1.68 亿美元卖给了私人企业。而保留下来的只是私人垄断资本干不了、不愿干或对私人垄断资本运营有帮助的国有企业。肯尼迪上台后在一项声明中更是明确强调：“私人企业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下，应当是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



这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唯一抉择。国家只应生产私人企业所不能生产的东西。”对国有企业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色彩由此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出现以英国为典型的私有化浪潮。其表面原因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正像英籍印度经济学家辛格所指出的：“在英国，政府原来的意图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上的。当时撒切尔首相认为，这是打破工会权利的好办法，因为当时的工会权利在所有国家控制的企业中是非常强大的。”同时，西方借此机会推销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以私有化为主旨的经济变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我国经济理论界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意识形态的意蕴也是很强的。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但统治阶级仍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待和处理之。而我国的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公有制企业，将这种性质的企业私有化反认为与意识形态无关或无关宏旨，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

其次，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必然动摇甚至瓦解党的执政地位。

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空洞的，它必须体现在党的具体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当中。在现阶段，我们党的经济主张就是通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把作为公有制主要形式的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公有制占主体的制度安排将会失效，党的经济主张必然发生实质性变化，共产党



作为唯一有效的执政主体的现实和理念必然受到挑战。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之上的。正是这种经济主张和制度安排才需要共产党的领导。而也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这种经济主张和制度安排得以实现。一旦这种关系被破坏，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作为唯一执政主体的合法性。这一点我们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国家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不管是工党还是保守党，其基本政治主张、经济主张是一致的。因此，不管谁上台，基本制度安排是不变的。而我国基本制度安排一旦发生变化，必将导致意识形态的变化及执政主体的变化。这是每一个拥护社会主义，希望民族复兴的人所不愿看到的，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我们真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吗

在国企改革中，有人认为，国有企业根本就不是市场经济的合格主体，因此必须私有化。这种主张的基本理论依据是市场经济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这个依据显然来自西方经济学。同时，也使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问题凸现出来。

主张市场经济体制下维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人士将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准备时间短。虽然我国一开始就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但真正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则是 1992



年。在此之前，权威部门召集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研讨改革问题，据当事人回忆，主张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仅三人，绝大多数都不赞成。但仅两年后，就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原来不赞成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经济学家从政治上拥护容易，从经济基础理论上论证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为什么能建立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显得过于仓促，理论准备不足。其二是思想资源匮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除了哲学依据外，找不到经济理论依据。就后者来讲，能够作为思想资源的仅是起源于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的发展可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出现的以奥斯卡·兰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他论证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市场与计划的并存及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性。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80年代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以南斯拉夫的霍尔瓦特、波兰的布鲁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他们分别提出和论证了“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论”等。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左翼学者总结了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针对右翼学者的挑战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有英国学者戴维·米勒斯提出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美国学者约翰·罗默提出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及美国学者戴维·施威卡特提出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从三个阶段的理论内容来看，兰格的理论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第二阶段的理论提出的是计划体制框架内